

帖木兒宮廷如何收藏中國瓷器

(註一)

俞雨森

帖木兒王朝(約一三七〇~一五〇七)和明朝(一三六八~一六四四)的密切往來，使得大量中國瓷器在這一時期流入中亞和伊朗。本文討論十五世紀中亞和伊朗的帖木兒諸王宮廷如何使用，並有意識地收藏和展示中國瓷器的現象。收藏中國瓷器不僅是上層貴族財富和權勢的象徵，也是個人品味的反映。帖木兒王朝中瓷廳的出現使這種收藏行為更加規模化，真正成為宮廷文化的一部分。本文將分析瓷廳的建築形式和裝飾如何服務於展示瓷器收藏的目的。

帖木兒王朝宮廷的中國瓷器收藏

一四〇三年，西班牙卡斯提爾王朝的亨利三世(Henry III of Castile, 1379-1406)派遣以大臣克拉維約(Ruy González de Clavijo, ?-1412)為首的使團一路追隨拜謁帖木兒，終於在一四〇四年九月抵達帖木兒的都城撒馬爾罕。通過西班牙使者的記錄，我們得以瞭解帖木兒的宮廷生活的細節。其中，他注意到帖木兒招待外國使臣的宴會上所使用的餐具：

當這些使者和其他許多來自遙遠國家的人按秩序坐畢，他們(內侍)即奉上豐富的(羊)肉，煮的，烤的，或用其他方式烹調的；還有烤馬肉。他們把這些羊肉和馬肉放在幾塊極大的皮革上。當主子(帖木兒)需要肉時，這些內侍拖曳這些皮革將肉品送到他面前，因為肉品的重量極大；當離他二十步的距離，負責切肉的内侍過來，跪在皮革上切肉。他們將肉切成幾塊，然後放置在各類盤

裡，有用金銀做的、陶制或玻璃的，或者瓷器，這是非常稀有和珍貴的。(註一)

對於十五世紀的歐洲人來說，中國瓷器無疑是罕見的，大量瓷器進入歐洲市場是十六世紀葡萄牙人開闢到達東亞的新航路之後才出現的現象。而對於穆斯林世界，中國瓷器在這時已經是熟悉的物品。尤其是在蒙元及之後的中亞和伊朗地區，瓷器甚至是宮廷的餐具等日用品，如克拉維約一行人觀察到的。可以肯定，帖木兒

宮廷中收藏和使用的中國瓷器的數量是相當可觀的。除了十五世紀從中國直接獲得之外，前朝的宮廷收藏顯然是構成其龐大收藏的一部分。由於年代較早，又缺乏相關的文字史料(如薩法維時期(一五〇一~一七三六)保留的財產清冊)，帖木兒宮廷的瓷器收藏的數字、構成已經很難復原。今天收藏在伊朗德黑蘭國立博物館(muze-yi javāhihāt-i mēl-yi Tān) (原阿德比爾神廟)和土耳其伊斯坦堡托普卡匹宮(Topkapı Sarayı Müzesi) 器型碩大的十四世紀中國瓷器最初應屬於伊朗的伊利汗王朝(一二五六~一三三五)，隨後輾轉流入帖木兒宮廷。

十四世紀早期，諸蒙古政權在伊朗和中亞等地區式微，繼之而起的帖木兒本屬撒馬爾罕附近渴石(Kesh)地方的突厥部族，在經年的征戰之後，他統治了今天中亞、伊朗、土耳其、敘利亞乃至印度等地。各地的珍寶和工匠盡歸帖木兒宮廷所有。在他去世之後，他的兒子沙哈魯定都赫拉特，其宮廷文化隨之發生了從黷武到崇文的轉變。而沙哈魯之子兀魯伯，則駐留在帖木兒的都撒馬爾罕，在名義上從屬於沙哈魯，但實際上則實行獨立的統治。由

於沙哈魯和兀魯伯持不同的政治和宗教立場，兩地的宮廷文化呈現出差異的面貌，但是兩者卻同時熱衷收集和使用來自中國的器物。瓷器就是其中最主要的類別之一。

瓷器是明初一項重要的外交禮物。明初政府嚴格控制瓷器的出口，景德鎮的瓷器出產直接由政府監督，至少在名義上瓷器只能以賞賜的形式從中國輸入海外，這一點不同於元代。(註三)《回回館譯語》收錄撒馬爾罕來人求討瓷器的來文：撒馬兒罕地面奴塔塔主丁(ṭaj al-Dīn)皇帝前奏，今照舊例，赴金門下叩頭，進貢玉石五十斤，小刀五把，望乞收受，朝廷前來討織金緞子磁碗磁片等物，望乞恩賜，奏得聖旨知道。(註四)儘管無從確定這位塔主丁是否的確是撒馬爾罕宮廷派出的使臣，或者僅僅是一位冒名的以玉石等所謂貢物換取瓷器的商人，但由此可以想見中國瓷器在中亞的渴求程度，同時也說明外人必須通過官方管道才能獲得。

因此，僅就器物的來源性質而論，帖木兒宮廷收藏的中國瓷器不同於其後的奧斯曼或薩法維宮廷的情況，從史料看，後者與中國的官方交往稀少，而明初的「瓷器外交」也已經開始轉變，因此獲得瓷器

依賴外銷瓷的大量出口。帖木兒宮廷所收藏的中國瓷器則主要來自明代官方的賞賜，一四一七年從汗八裡(即北京)到赫拉特的使團就被詳細地記錄在帖木兒朝的史書中。據記載，這次使團帶來了大量的禮物和財物(tuhā va bitāk-i bisyar)，除了鷹隼(shunqār)、緞匹(atlas)、各類各色絲綢或織錦(ātas; kamkha; tanghū)等，瓷器(ālat-i chīnī)也是重要一項。(註五)需求之旺盛也促進了進口量。根據《萬曆野獲編》的記載，「貢夷」一旦被允許歸裝貨物，僅瓷器一項，就多至數十車。可以間接推測在明代初年，即使朝廷控制嚴禁，帖木兒王朝仍然獲得了數量龐大的瓷器，可見兩地交流之密切。

從餐桌到瓷廳

如此數量可觀的中國瓷器進入赫拉特或撒馬爾罕等諸帖木兒王子的宮廷後如何被使用，一直以來未引起學者關注。瓷器首先具有實用的功能，如克拉維約看到的用於盛肉類等食物的餐盤應該就是體積較大的瓷盤，今天主要集中收藏在土耳其和伊朗；而玉壺春瓶等用於裝酒。這類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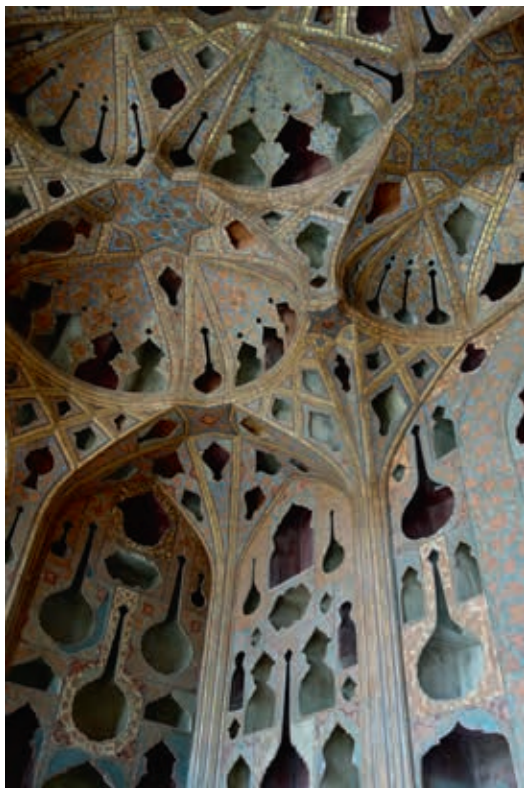


圖2 17世紀早期伊斯法罕（伊朗）瓷廳即目前的音樂廳 作者攝於2014年



圖3 17世紀早期阿德比爾（伊朗）瓷廳 作者攝於2011年

他的瓷廳位於他的赫拉特附近的加祖爾加赫（Gazur Gah）的花園內。瓦塞菲記錄道，一隻貓闖入他的瓷廳，從壁龕上打碎了一些瓷器。（註六）蘇丹巴依喀拉本人是否在他的宮殿綴世宮（Bagh-i Jahān Arāy）也有類似的瓷廳不得而知。但是這樣的收藏形式無疑只能局限在最上層的統治精英，納瓦依的巨額財富和權勢是他獲得大量瓷器，建造瓷廳的原因。

瓷廳的收藏不同於一般的宮廷國庫（Khazina）珍寶。克拉維約對帖木兒的國庫有過描述，位於地勢險要的城堡內，一般人難以靠近，甚至具有軍械庫的功能。（註七）而瓷廳顯然是一個令人心身愉悅的場所。它的建造地點常常是在花園內。波斯的花園（bagh）或小型花園（baghche）一般採用所謂的「四分式」（chahār-bāgh）的矩形結構，而瓷廳則以亭子的形式出現在其中。因此，除了存放，它還具有展示擁有者財富和品味的功能。

納瓦依的瓷廳今已不存，因此很難復原其具體的內部裝飾。瓦塞菲的《紀事編年》提到的以壁龕為陳設的建築形式則延續了下來。在距離約一百年後，伊朗薩法維王朝的統治者沙赫·阿拔斯（Shah Abbas, 1571-1629）就先後有兩座瓷廳，我們可以通過薩法維的例子來想像納瓦依的瓷廳。第一座是在他的都城伊斯法罕的阿里卡普宮（Ālī Qāpū）的第五層（圖一）（註八），隨後，在一六〇八年他又將這裡的瓷器奉獻給薩法維王朝在伊朗西北部城市阿德比爾的祖陵，將陵內中心的一座建築改造為第二座瓷廳。（圖三）這兩座建築都以滿牆的壁龕為特點，塗以金碧色作為裝飾，壁龕的形狀模擬不同瓷器的器型，應該是用於擺放各類瓷器。阿拔斯在赫拉特出生，



圖1 1494~95年 Khamsa of Nizami 大英圖書館藏 引自Timur and the Princely Vision, 頁227·圖140。

模式在這一時期大量的繪畫作品中都有所表現，成為反映理想的宮廷生活的固定模式。同時，瓷器顯然也是常見的裝飾品，從圖像資料看，帖木兒時期似乎特別流行用青花大罐插諸如風信子之類的花卉。（圖一）

從奧斯曼的例子看，作為單純的餐具之類的實用器可能屬於宮廷御膳房（Mabāh-i Āmīre）的財產，所以如今托普卡巴宮的瓷器多陳列在御膳房。帖木兒時期應該也是類似的情況。但是在收藏數量不斷增加後，瓷器的功能隨之發生了轉變，新的收藏模式開始出現。作為宮廷或者權貴財產的一部分，瓷器的裝飾性陳設逐漸固定化，形成一種稱為瓷廳（chini-khana）的建築形式，專門用來存放甚至展示個人的瓷器收藏。根據瓦塞菲（Vāsītī）的《紀事編年》（Badāyī al-vaqāyī）的記載，在十五世紀晚期的赫拉特，帖木兒蘇丹巴依喀拉（Sultan Husayn Bayqarā, 1470-1506）（一四九〇~一五〇六）的親信納瓦依（Ālī Shīr Navāī）（一四四一~一五〇一）擁有一座屬於他個人的瓷廳。納瓦依憑藉其與蘇丹的關係，在政治和文化上具有極強的影響力，是這時整個呼羅珊省最富有的人。



圖5 15世紀早期 景德鎮(?)青花瓷磚 出土於兀魯伯瓷廳故址 國立烏茲別克斯坦文化歷史博物館藏 Elena Paskaleva攝



圖6 15世紀早期 景德鎮 青花地磚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圖7 15世紀早期 敘利亞 青花瓷磚 Inv. nos. D 48-52/1986 & D 54-55/1986 The David Collection, Copenhagen Pernille Klemp攝

產自中國，但是形狀和紋樣是由帖木兒工匠設計的。這批瓷磚是兀魯伯爲了裝飾瓷廳而專門向中國訂製的。

首先，兀魯伯瓷廳所用的瓷磚在形狀上不同於現存的宣德青花瓷磚。巴布爾記錄的真實性是可以信任的。他在《回憶錄》中特意提及瓷磚出自中國，相隔瓷廳建立的時間大致五十年，說明這個資訊在

當時已經得到公認。在明初也的確存在青花瓷磚從中國出口現象。霍吉淑 (Jessica Harrison-Hall) 認爲大英博物館 (The British Museum) 藏的一對袖下彩青花瓷地磚就是宣德年間景德鎮官窯的產物 (圖

六)，專門滿足穆斯林國家的需要。(註十) 這對瓷磚呈方形，器壁較厚，藍底白花，三圈波浪狀的花紋包圍位於中心的花卉圖案，四角邊緣處再以花葉紋裝飾。但是，兀魯伯瓷廳所用的瓷磚的六邊形形狀明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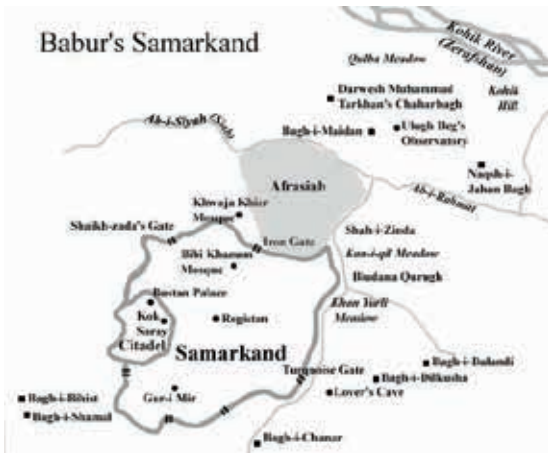


圖4 根據巴布爾描述復原的撒馬爾罕地圖 引自<https://depts.washington.edu/silkroad/texts/babur/babur1.html>

科希克山麓即紮拉夫尚河畔 (Zar-i-shan)，位於撒馬爾罕主城的東北部。當時居民的宅邸多散落撒馬爾罕主城的城牆之外，王室顯貴們的私人花園也多位於郊區風景優美的地方。根據巴布爾提供的資訊進行位置復原，瓷廳所在的小花園位於兀魯伯著名的天文臺的西部，緊挨著廣場花園 (bagh-i maydan)。(圖四) 根據巴布爾的描述，這座瓷廳之所以得名，是因爲牆面用中國的瓷磚裝飾的原因，但是這座建築本身是否和納瓦依的瓷廳一樣是用

於收藏和陳設瓷器則不得而知。筆者認爲，兀魯伯的瓷廳也是瓷器收藏的地點，用中國瓷磚裝飾牆面則加強了瓷廳和中國的關聯。

Chini-khāna 除了瓷廳，也可以被直譯爲中國廳。在建築形式上，瓷廳的裝飾常常刻意使用某類波斯文化所理解的中國元素，如壁龕結構所採用的穆喀納斯結構 (muqarnas) 可能有意模仿了中國建築的榫卯結構，而瓷磚的使用更強化了建築的「中國」屬性。阿德比爾的瓷廳壁龕的下方也使用了瓷磚。兀魯伯瓷廳的特別之處在於其瓷磚是從中國專門採買的。帝俄和蘇聯時期 (Vatkin, 1908-1909; Rempel, 1941) 兩次對該遺址進行了考古挖掘，的確發掘出了青花白底的六邊形瓷磚。目前只有兩塊瓷磚存世，其中之一目前陳列在國立烏茲別克斯坦文化歷史博物館 (State Museum of History of Culture of Uzbekistan)。(圖五) 中國使用瓷磚或所謂的琉璃瓦的傳統悠久，但是青花瓷磚只見於明初宣德年間 (一四二六—一四三五)，北京故宮博物院現在仍有收藏。在對比這片所謂的「中國瓷磚」和現存的宣德青花瓷磚之後，可以得出一個暫時的結論：這片瓷磚的確是

瓷磚和瓷廳

納瓦依的瓷廳並不是文獻最早記錄的一座。十五世紀早期，在兀魯伯 (一三九四—一四四九) 統治的撒馬爾罕

瓷廳已經出現了。兀魯伯的瓷廳也已經消失，目前所知的資訊基本來自印度莫臥兒 (一五二六—一八五八) 開國皇帝巴布爾 (一四八三—一五三〇) 用察合台突厥語寫的《回憶錄》(Babur-nama)。作爲帖木兒王子的巴布爾在一四九七年短暫地佔領過撒馬爾罕。在他的《回憶錄》中，他簡短地描述了兀魯伯的瓷廳：

科希克山麓，兀魯伯·米兒咱還辟了一個小花園 (baghche)。……在這個小花園裡也有一個亭子，稱爲瓷廳，因其牆面的下部 (Tara) 全部爲瓷磚所鋪砌。這些砌磚是他派人去中國 (Khaitiy) 採辦來的。(註九)

一直到十七歲才離開赫拉特成爲沙赫，他很可能親自到過納瓦依的花園和瓷廳(如果當時仍然存在的話)，納瓦依的瓷廳因此很可能成爲他在伊斯法罕和阿爾達比爾同類建築的原型。

註釋

1. 臺北故宮博物院器物處黃蘭茵助理研究員在「適於心—明代永樂皇帝的瓷器」特展開展之際邀請筆者寫作本文，並提供了院藏青花折沿洗的例證；荷蘭萊頓大學 Elena Paskaleva 博士慷慨地提供了兀魯伯瓷廳的考古發掘資訊和其在烏茲別克斯坦考察的照片；北京故宮博物院瓷器部的孫悅老師則告知了故宮藏永宣時期瓷磚的情況，在此一併致謝。
2. Clements R. Markham, *Narrative of the Embassy of Ruy Gonzalez de Clavijo to the Court of Timour at Samarcand, A.D. 1403-6*, trans. with notes, a preface, and an introductory life of Timour Beg, London: Hakluyt Society, 1859, p. 134.
3. Regina Krahl, "Porcelain Diplomacy", Sotheby's, <http://www.sothebys.com/en/news-video/auction-essays/chinese-works-of-art-n09317/2015/02/porcelain-diplomacy.html>
4. 本田実信，《〈回回館譯語〉に就いて》，《北海道大学文学部紀要》第11期，1963，頁152。
5. Abd al-Razzāq b. Ishāq Samarqandī. *Maṭla'-'i sa'dāyn wa majma'-'i baḥrayn*. Part 2, ed. Muhammad Shafī. Lahore: Gīlānī, 1365-1368/1946-1949, p. 354. 也有學者認為，所謂的 ālāt-i chīnī (可直譯為中國物品) 包括中國的漆器，見 Priscilla Soucek,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Makhzan al-asrār and Its Importance.", *Ars Orientalis*, Vol. 18, 1988, pp. 10-11.
6. Zayn al-Dīn Maḥmūd Vāṣifī, *Badāyī' al-vaqāyī'*, 引自 G. A. Bailey, "The Dynamics of Chinoiserie in Timurid and Early Safavid Ceramics," in *Timurid Art and Culture: Iran and Central Asia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ed. Lisa Golombek and Maria Subtelny, Leiden: Brill, 1992, p. 189.
7. *Narrative of the Embassy of Ruy Gonzalez de Clavijo to the Court of Timour at Samarcand, A.D. 1403-6*, pp. 172.
8. 這層現在被稱為音樂廳。但是最新研究認為這裡應該是沙赫阿拔斯在將瓷器搬到阿德比爾之前用於收藏瓷器和抄本的地方，見 Kishwar Rizvi, *The Safavid Dynastic Shrine: Architecture, Religion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Iran*, London; New York: I.B. Tauris, 2011, p. 153.
9. Ṣāḥīb al-Dīn Muḥammad Bābūr, *Bābūr-nāma (Vaqāyī')vol. 1: Critical Edition Based on Four Chaghatay Texts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ed. by Eiji Mano, Kyoto: Syokado, 1995, p. 72.
10. Jessica Harrison-Hall, *Catalogue of Late Yuan and Ming Ceramics in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2001, pp. 139-140.

參考書目

1. Abd al-Razzāq b. Is āq Samarqandī. *Maṭla'-'i sa'dāyn wa majma'-'i baḥrayn*. Part 2, ed. Muhammad Shafī, Lahore: Gīlānī, 1946-1949.
2. G. A. Bailey, "The Dynamics of Chinoiserie in Timurid and Early Safavid Ceramics," in *Timurid Art and Culture: Iran and Central Asia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ed. Lisa Golombek and Maria Subtelny, Leiden: Brill, 1992, pp. 179-190.
3. Kishwar Rizvi, *The Safavid Dynastic Shrine: Architecture, Religion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Iran*, London; New York: I.B. Tauris, 2011.
4. *Narrative of the Embassy of Ruy Gonzalez de Clavijo to the Court of Timour at Samarcand, A.D. 1403-6*, trans. with notes, a preface, and an introductory life of Timour Beg, by Clements R. Markham, London: Hakluyt Society, 1859.
5. Priscilla Soucek,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Makhzan al-asrār and Its Importance.", *Ars Orientalis*, Vol. 18, 1988.
6. Regina Krahl, "Porcelain Diplomacy", Sotheby's, <http://www.sothebys.com/en/news-video/auction-essays/chinese-works-of-art-n09317/2015/02/porcelain-diplomacy.html>
7. Lentz, Thomas W., and Glenn D. Lowry. *Timur and the Princely Vision: Persian Art and Cultur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Los Angeles and Washington, DC: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and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1989.

格極高，符合兀魯伯當時尊貴的身份。筆者尚未在其他中國瓷磚上發現這種現象，但是在帖木兒瓷磚上描金裝飾則並不罕見，因此仍有待研究和確認。

本文回顧了帖木兒宮廷收藏中國瓷器的歷史。在帖木兒朝之前，穆斯林世界已

經開始使用中國瓷器，但是從單純的使用到成規模的系統收藏是發生於十五世紀中亞的獨特現象。瓷廳是這種現象發展到頂峰的表現，這種以中國裝飾風格為訴求的伊斯蘭建築形式，是之後歐洲一系列類似建築（如中國式樣的塔等）的濫觴。它的

出現真正說明瓷器的收藏和展示已經成為帖木兒宮廷文化的一部分。

作者為海德堡大學博士研究生



圖8 明 宣德 青花波濤花卉紋折沿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異於這種方形瓷磚。中國現存的青花瓷磚沒有六邊形的例子，一般都是方形或長方形。而伊斯蘭世界則相反，六邊形的瓷磚是主流，這種形狀的瓷磚在敘利亞尤其常見。（圖七）帖木兒於一四〇〇年征服敘利亞，隨之將敘利亞當地的傑出陶瓷工匠作為戰利品帶回撒馬爾罕，這種六邊形瓷磚形制也隨之帶到中亞。因此，這種具有明顯敘利亞（隨後帖木兒）風格的六邊形瓷磚應是由帖木兒工匠設計之後，向中國官方訂製。

之所以認為這批瓷磚是產自中國，是因為其工藝明顯優於同時期敘利亞或者中亞的瓷磚。瓷磚藍白分明，紋飾複雜，卻形制謹嚴，花蕊式圖案為中心，以花瓣紋飾包圍，最外層則是近似纏枝紋，在紋飾結構上接近宣德時期的方形瓷磚。這種結構的紋飾也可以在同一時期的瓷器上看到。臺北故宮院藏的一件宣德青花波濤花卉紋折沿洗的內底心就採用了類似的幾何圓形花紋（圖八）；而同時期的敘利亞瓷磚多以植物圖案裝飾如圖七，風格更為自由爛漫，和兀魯伯瓷廳使用的瓷磚有明顯區別。值得注意的是，兀魯伯瓷廳使用的瓷磚用了金彩的工藝如圖五，可見這種瓷磚的規